



DUKU

读库

1503

DUKU



1503

主编 张立宪

新 星 出 版 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读库·1503/张立宪主编. —北京：新星出版社，2015.6

ISBN 978-7-5133-1832-7

I . ①读… II . ①张… III .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 ①I217.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21390号

读库1503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谢刚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话：010-88310888

传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经销电话：010-80897213

官方网站：www.duku.cn

邮购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邮局67号信箱 100036

印 刷：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645mm×925mm 1/16

印 张：20

版 次：2015年6月第一版 2015年6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33-1832-7

定 价：30.00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1—52 双村记	痘弦 口述 / 王立 记录整理
53—111 超级人工智能之路	蒂姆·厄班 (Tim Urban)
112—132 家长的小升初	马国兴
133—180 上海交大解放日记	何季民 编辑整理
181—217 壳中之魂	洪韵
218—262 私人文学史 (续)	孙玉祥
263—289 丁香花迷雾	王鹤
290—309 十二星座	王巍
310—317 她的美曾使我疑惑	熊菂

双村记

癌·弦 口述

王立 记录整理

一个人如果有完整的对故乡、慈母的记忆，可能够他写一辈子。

回忆我的故乡，要从古诗《十五从军征》说起。“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遥看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舂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羹饭一时熟，不知贻阿谁？出门东向看，泪落沾我衣。”诗歌描述的是一个出征多年的人回乡，家里人都去世了。老房子还在，一片荒凉，他进去看到野兔在狗洞里跑来跑去，雉鸡在梁上飞来飞去。他到天井里煮熟了野菜，却不知道端给谁吃。我读这首诗的时候，大概十二三岁，不相信世界上有这么悲惨的事情。可是现在想一想，我还不如那个《十五从军征》的老兵啊！因为他八十还能归乡，而我却一直飘零在外。年轻时读诗，觉得是文人的夸张，哪里知道这样的命运也会降临到自己身上？

我离开家时十七岁了，所以对家乡的记忆非常完整。我的文学创作很多都是围绕着母亲和故乡两个主题。像我诗中的红玉米晒在房檐下、春天来了孩子们在打麦场上滚铁环，都是来自对故乡的怀念。后来我的诗歌写作中断了，我曾想过有一天我再写诗时会写什么，想来想

去，还是故乡。故乡真是一辈子写不完，而且人是越老越想家、越老越想父母。因此，一个人如果有完整的对故乡、慈母的记忆，可能够他写一辈子。当然，根据他年龄不同、艺术技巧不同，会体现出不同的风貌，可这是永不止息的主题。故乡是我永难忘怀的，如一首诗中所写：

你离家这么多年了
怎么还带着那顶破斗笠
不，那是故乡的屋顶

现在，在我八十多岁时，我最想写的还是我的故乡回忆。

所谓“双村记”，一个村子是我们家的村子，一个是我外婆家的村子，中间差十二里地。我的故乡在河南省南阳县，我从小就在这两个村子间游走，稍大才去了县城。两个村子加上南阳县城，就是我对故乡的全部记忆所在。

平乐村

外婆家的村子是黄土地，我们的村子是黑土地。外婆家是明末从山西迁过来的。从山西移来的时候是一个大家族，官府就地分家——河那边是萧坡，河这边是平乐村。他们把一口铜锣断开，两半破锣分别给两边的村子，将来把两半破锣的茬口对起来，就能看出原本是一口锣，也就是一家人。要子子孙孙不忘本，永远记住是一脉所出，以后要互相帮忙。“破锣”两个字音化为萧坡的“坡”和平乐的“乐”。外婆他们在平乐村。他们村里有几家大户盖的是瓦房，形制看起来像山西的房子，青砖青瓦、五间头、四合院。我们王家祖上也是山西来的，但没有家谱，一穷二白。我们的村子就很简陋，都是草房。我妈妈为什么嫁到我们村？因为外婆家后来渐渐穷了。我爸爸家有几亩田，娶了没落的大户小姐。外婆家的村子和我们的村子对比鲜明，一边富有文化气息，一边是蛮荒之地。

明末时河南人少，官府逼着山西民众南迁，还要有各行各业的，比如懂医药的、懂建筑的，读过书能识字的。他们来的时候带来了文

化。外公家族一直经营着药铺，外公就是眼科大夫——在我们那里眼科医生叫“眼科先儿”——他开个药铺，也看病。我小时候就在这个药铺里跑来跑去。外公非常想让他子女继承衣钵。我妈妈是长女，下面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妈妈和两个姨能帮他抓药，但没学会中医。外公又希望我能继承，我小的时候他总是编故事讲这些事儿，可惜我也没有继承他的事业。

外公除了门诊，还做眼药。眼药是半流体的，有的装在高粱叶子上，乡下人叫“桃粟搁儿眼药”——家乡管高粱叫桃粟；有的也装在螺壳儿里，用蜡密封起来，还贴着药名和字号。外公也看病。他看病收费非常低廉，穷人买药就收个成本钱或者完全免费，一般的顾客就是半价，因此他在乡里间特别受尊敬。在我幼年的记忆中，药铺的味道非常好闻，我在那些高与梁齐的药柜间跑来跑去。药铺里敬着泥塑的骑着老虎的药王爷孙思邈的像，一进门就能看到。药铺里有一副对联，“但愿世间人无病，何妨架上药生尘”，横批是“杏林春暖”。

我小时候喜欢偷吃外公的甘草，甘草很甜，小孩子总是喜欢吃甜的。我想外公早就发现了，但他从来不讲。生地也可以吃，不是那么甜。再大了，就是向外公要木通。木通不是吃，是放在墨盒里。上小学后，每个孩子都有一个墨盒，墨盒里有一块棉花，我们研了墨汁，或买现成的墨汁，倒在墨盒的棉花上，棉花上面要再盖一个东西，写字时笔就不会沾上棉絮。通常是去药店拿一块木通——盖木通的办法就是外公告诉我的。

乡下人管砚台叫“砚凹”，那时以研墨为主，墨汁还不流行，要去大的镇子上才能买到。过去中国人的诗为什么写得那么好？我想是因为写诗前麻烦事儿太多，要研墨、发笔，研墨研半天才能写诗，正好构思。发笔是说新毛笔或干硬的毛笔都要用温水发，水温不要高，也不是冷水，要慢慢把笔泡开才能用。写字要有好的环境，好的心情。这些事情都做完了，也能静下来写了。

外婆胖胖的，非常慈祥。她最喜欢我们帮她抓痒。抓的时候逗我们说：“你这娃儿，哪里不痒你抓哪里。”她还会唱各种歌谣，比如抱着我时她会唱：“抱外孙，不如抱草墩儿。”外婆虽然平时很和善，但

厉害起来也很厉害。有一年，贼人来偷东西，给她发现了。老太太就跟他们理论，把贼骂得抱头鼠窜。

我在外婆家非常快乐。当时不晓得有“文化”这个概念，现在觉得他们家是有文化的。他们家有秩序。当时也不知道秩序是什么。反正我家那边就是赌博场，还有土匪出入。而外婆家感觉不一样，我一到平乐村就不愿意走。走的时候大人把我放到牛车上，我哭着跳下来，就是不想走。

他们大户人家的家族规矩很大，大哥就是大哥，大嫂就是大嫂，出入应对都是有一套规矩的。兄弟姐妹排行都是按照家族大排行，所以我有十三姨啊、二十表哥啊。我妈妈是老七，他们都喊她“七姨”，我大姨是老八，小姨是老九。一个管一个，秩序井然。

他们每一家都有铜器，就是锣、鼓、钹、铙等等，要过年才打着玩儿，每家都打，好不热闹。我就是在外婆家学会了打鼓。念小学时我是鼓乐队的“要角儿”——打大鼓。

外婆家在一条大河旁边。这条河从南阳流过来，一直流到襄阳，注入汉水，是可以行船的。我们在河里游泳——家乡管游泳叫“洗澡”——男孩子调皮，扒着去远方的船游好久。船上有使舵的女孩，跟我们笑，我们就跟着船漂，漂到激流的地方就上岸了，再跑回来。我特别喜欢这条河，一天到晚在河里玩儿，它的名字叫白河。李白曾几次经过南阳，“走马红阳城，呼鹰白河湾”就提到了白河。

年龄稍稍大些时，我就更野了。有一次大概是船老板和他太太回娘家了，没人开船。我们一群野孩子就把这条船划走，也去摆渡，接客人。过路的客人还真上了一船，有卖油的、挑担儿的，还有些老太太。到了河中间，我们把船用篙一定，要收钱，没有钱不开。有几个老太太骂人：“你皮吧，我认识你妈。我告诉你妈去，你就得挨揍。”听了这话，我们哪还敢要钱，赶紧开船。渡船本来是不要钱的，船夫每年收粮食。秋天打粮食时，他去码头两边的村子里挨家收粮食，给多少算多少，没粮食给点鸡蛋也行。《皇冠》杂志有个专栏叫“青春岁月”，访问过很多人，我也是其中一个。我把这个故事说出来，张爱玲看到后，给我来信说，她读了访问记上这段场景，觉得很苍凉。我们当时只是一

味调皮，哪里知道苍凉不苍凉。张爱玲还说：“这题材太好了，你应该自己写。”

连阴雨久了，沟满河平。河上涨大水的时候，从上游冲下来很多东西，有树干、家具、牲口等等，下游的人就在河里捞东西“发洋财”。河边的沙子都是细细的白沙，被风刮成沙岗——现在当然都被现代化建设给用掉了。孩子们喜欢从沙岗上打滚滚下来，一点都不痛。沙子也侵蚀旁边的果园，果园里的沙子越堆越高，已经接近果树枝子了。我们觉得最过瘾的是躺在树下，不用动手，只用嘴巴接着就能吃到水果，吃完了再吃另外一个。那时小孩子去果园里偷吃是可以的，园主基本上不管，我们就觉得痛快得不得了。桃核儿留下来，穿成串挂在脖子上辟邪——桃树是鬼的舅舅，鬼怕桃树。

因为有沙地，花生种得很多。家乡管花生叫“落花生”。花生播下去很容易生长，长到一定时期，小孩子就去地里刨花生吃。用脚把花生周围的土踢松，用手把花生勾出来，将大个儿的取下，再把秧子埋进沙地，小的花生还能继续生长。收获花生时，是连着沙子一起铲起来，放到一个大得像双人床似的可以摇晃的筛子里，从两边一起摇晃，沙子就漏下去，剩下花生和花生秧子了。再把秧子和花生拿到场上，晒干了去掉秧子，留下花生。每一家都有个花生仓屋，花生堆到梁那么高。我们喜欢从高处滚下来，好不快乐。收获的花生除了自己吃，大部分都卖掉，是每家的重要收入。小孩子没玩具玩儿，就拿两个花生，用尖儿的部分顶，谁的破了谁输花生。那也能玩半天。

外公和他弟弟（我叫叔公）两家中间有口井，有条小路。井旁一年四季都有女人在洗衣服。往常洗衣服的时候，洗干净了，把衣服拿回家放在米浆或者高粱浆中上浆，然后晒。晒得半干时，放在平的石头上用棒槌槌。古诗有“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有人说黑灯瞎火的，怎么能洗衣服呢？晚上妇女去河边也不安全啊。其实不是洗衣服，是槌衣服——衣服晒了一天，到黄昏后晒干了，不用熨斗，用棒槌敲打。槌打过的衣服特别整齐，简直可以站着不倒，穿起来也体面。井里有柳条编的辘轳，夏天把瓜果用柳条篮子系到井的深处，第二天拉上来吃，这种水果叫“井畔凉”，吃起来很过瘾，像现在的冰淇淋那样。家乡的柳

条去了皮，又细又白，编成器具后密不漏水，特别受欢迎。

我家里剩下的老东西，是妈妈做针线的篮子，也是柳条做的。还有就是那个槌衣服的石头，红卫兵来破“四旧”，拿它也没奈何，因为搬不动，就劫后幸存下来了。我小时候常常坐在上面，小孩子不穿衣服，凉凉的很舒服，这个印象非常深。有一年回乡，我对太太说，真想把那块石头运过来，运到加拿大来，将来百年后就枕着那块石头，那是我家的东西。

我爸爸是在青海劳改营过世的。那个时候去劳改营要自带行李，所谓行李，就是家里的一床老棉被。那床带到异地的棉被就成了家的象征。很多死在劳改营的人的遗言就是“死后把我裹在我的棉被里”——用家里的棉被裹起来就是最大的心愿了。可是青海那种地方，两三千米的海拔，天寒地冻，晚上人一断气，棉被往往就被拿走了。从家里带出来的老棉被就是家，那个槌衣服的石头，也让我觉得是我和已经不在了的那个家的关联。

外婆家的房子非常结实。据说盖房子时，我妈妈的祖母对工人特别好，有吃有喝，一下子是汤面，一下子是包子，一天好几顿，还有酒，水烟袋就有好几把，摆在那里给工人们抽。工人们士气大振，拼了命盖得要多结实有多结实。清末盖起来的房子，泥巴做的，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回乡时，房子还在。墙很厚，屋顶铺瓦，梁用的是上好的木头。那所房子后来被当队部了，外墙上还漆了黑板写板报——家里的老东西几乎都没有保存下来。过去村子里瓦房不多，瓦房是富贵的象征。人们不是盖不起瓦房，是置地要紧，省吃俭用，有了钱都买地。

我一直不知道母亲的名字。小时候我问她：“妈，你叫什么名字？”她不讲，整个脸都红了：“你小娃儿问这个干啥？”妈妈没上过学，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她可能觉得不好意思，所以不讲。村子里也不作兴称妇女的名字，都是大妈、二婶儿的。门牌上记录已婚妇女的名字都是某某氏，比如我妈妈就是王萧氏。外婆家，从我大姨开始时上“洋学”，后面几个孩子都去学校念过书，只有我妈妈那个时候不念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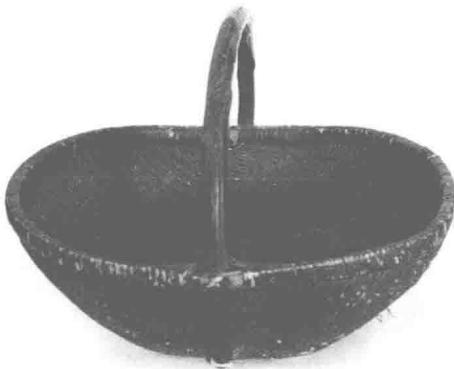
我和小姨一起去念过“洋学”。外婆家和我们家那边的小学我都念过。记得外婆家那个小学一进门是影壁墙，上面是孙中山的像，还有

党国旗，下面种着石榴。教室里挂着好几个门板那么大的算盘，算盘子儿串在有毛的杆儿上，叫“毛算盘”，这样算盘珠不会乱动，摆好公式后就停在那里，做教学用。学校是公立的，免费。

到台湾后填表格，母亲的名字实在不好意思写“王萧氏”，但又不知道妈妈的名字，就根据模模糊糊的记忆写了“萧芸生”，其实那是我大姨的名字，她们的名字是押“生”字。小姨是萧萍生，舅舅是萧芝生，后来才知道我妈妈的名字叫萧芳生。大姨夫是中央军校的学生，婚后三个月去当国军到东北打仗，生死不明，没有再回乡。大姨就这样守了他一辈子。我到台湾后，还登报寻找大姨夫。有一天接到一个电话，说是大姨夫的朋友，说他们在东北被打垮，就冲散了，他也没再见到我大姨夫。四九年后，大姨不敢提她家的事儿，将孩子的姓改姓萧。

妈妈没有上过洋学，也没有念过私塾，基本上不认识字，但她的刺绣方圆七十里地都闻名。河南不叫“刺绣”，叫“扎花儿”。每年都有很多亲朋好友来找她绣东西。我现在特别喜欢收刺绣，看到就想买下来，心想“说不定是我妈做的呢”。她会绣云肩霞帔，整套的新娘礼服都能绣；也绣手绢、耳护、荷包；也绣烟袋包送给佃农当礼物——中国人有自己的审美观，不放弃任何显示美的意识。我最喜欢跟妈妈在灯下活动，她在灯下扎花，我给她整理线帖。线帖像现在照相本那么大，每页上有纸艺折的一兜一兜的小袋子，每一兜里面装一种线，表面是平的，拉开了能取用里面各种颜色的线，一页大概能装七八种。有时候我饿了，妈妈就用上鞋的长针戳了很多生花生仁儿，在油灯的芝麻油里蘸一下——家乡产芝麻，油灯里烧的是芝麻油——再在油灯上烤。烤出来很香。但不能马上吃，要等一下，烤完了针是红的，要凉一下再吃。妈妈六十年代病故在乡下。她人缘不错，虽然臂上带着黑五类的臂章，但是村里人还是“大妈”、“大妈”地叫，背着干部偷偷给她东西吃。

我舅舅读的是陆军军官学校，当职业军人。妈妈说他离家时来过我家。我小时最崇拜舅舅，可他来时我很害臊，用被单子蒙头盖着，躲在下边不敢看他，闭上眼一直笑。舅舅把被单子掀开，我又把被单子拉起来，还是闭上眼笑。结果我始终也没看到他。我流亡之前，舅舅再也没回来，我一生都没见过他。在我的家乡，管舅母叫“妗子”。我妗



疙弦母亲用的针线篮子，串门儿用篮子装着针线活儿。篮子是以柳条编织而成。当地柳条制品很出名，可以编得密不漏水。



家里用的油灯。上面的灯盏是活的，可以拿下来手持照明，有现在手电的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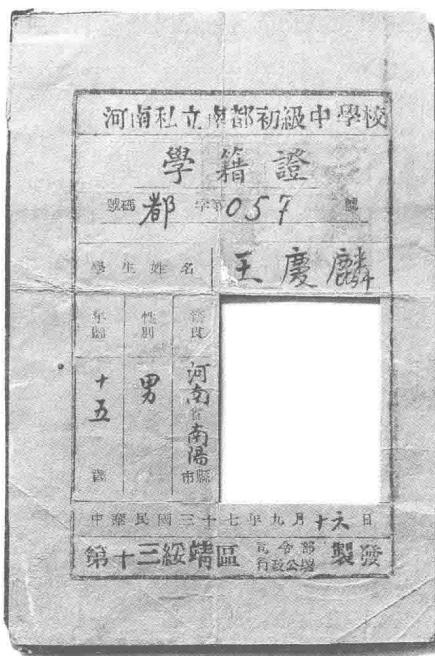
陶土火筐，可以提着随时烤火取暖。痴弦再回故乡时，老瓦匠将唯一的存货送给了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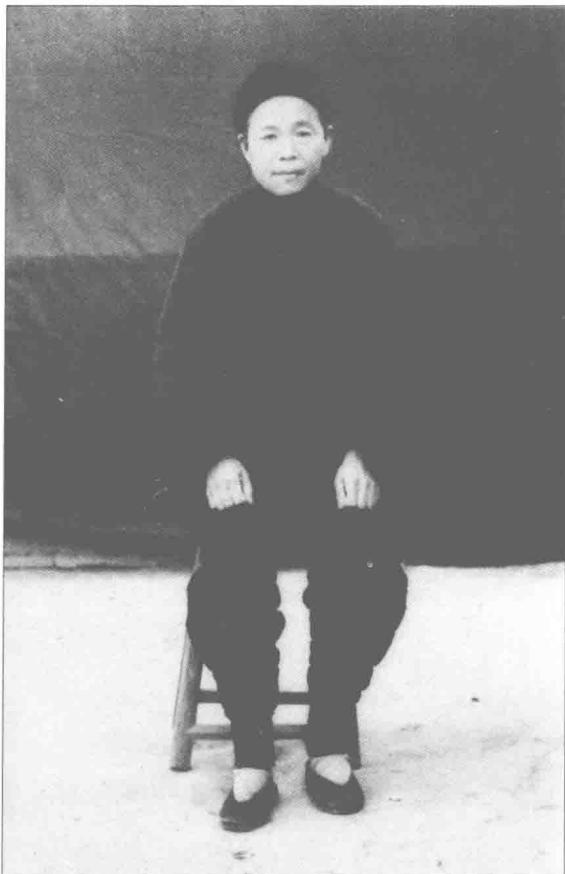
痴弦幼年打的铜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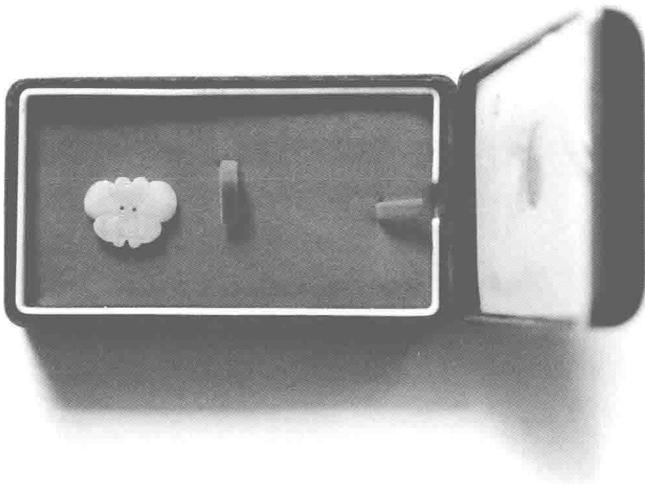
癌弦的高小毕业证书。照片缺失。因为当时照相不普及，所以照片往往一张多用。校长是马文学，是癌弦父亲简易师范的同学。癌弦的父亲也曾在那所学校教过国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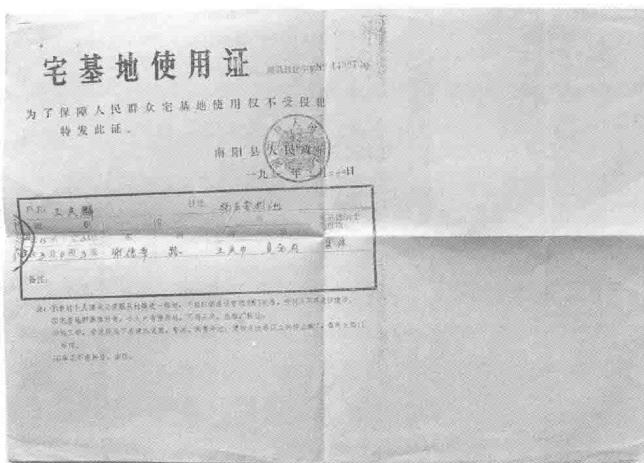
癌弦的初中学籍证。照片被剪去作他用。



在癌弦堂弟的劝说下，癌弦的母亲生前照了这张相。这是她留在人世间的唯一照片。



痘弦母亲护额上的玉牌。



杨庄营宅基地使用证。

子卧房里挂着舅舅的一张戎装照，还有他的一把小佩剑，是蒋介石送给黄埔军校毕业生的，上面写着“成功成仁，蒋中正赠”。我小时候去外婆家，一定去妗子屋里摸那把佩剑。看着他的戎装照，觉得好威武。十七岁离开家的时候，父母的照片都没带，只觉得是去南方，还会回来，不觉得是永诀，却带了舅舅的一张照片——我想去找他。我想如果找到舅舅，他不认识我，我就把这张照片给他看。我当然没有找到他了。他后来退伍回家，四九年后当过小学教员，也死于历史问题。妗子在清算时疯掉了，害怕听到开会的锣声，一听到锣声就往门后躲，害怕被批斗。

八十年代末我回去扫墓时，给外婆外公、舅舅妗子立了碑。碑文是我自己写的，到蒲山店订的石碑。我交代石匠，碑上不要刻我的名字，刻表弟们的名字。我在村子里请了两台吹打，摆了十几桌酒席。我姨他们因为黑五类等等成分不好，多年来在村子里地位都低，抬不起头来。运动来了，对他们要打就打，要骂就骂——那次立碑时把三生祭礼、纸扎的童男童女都摆在方桌上，抬着在村子里游行，边游还边给围观的群众散烟。我姨抬头挺胸的，觉得总算为他们争了一口气。

平乐村是我最喜欢的。如果我再给自己另取一个笔名，就要用“萧”这个姓，叫萧梦白——我们这辈是“梦”字辈——取“梦到李白”之意。我的两个孩子一个叫景萦，一个叫景苹。“苹”是为了纪念我外婆家的“平乐村”，“萦”是为了纪念我们自己的村子“杨庄营”。

杨庄营

和外婆家不同，我们家祖上就很苦。苦到什么程度？那还是清朝的时候。大年三十儿，我的曾曾祖父（高祖父）家里连一点面、一粒米都没有。曾曾祖父就到集市上去卖门神、春联、灶王爷。几个小孩已经饿了好几天，饿到前心贴后背了，以为爸爸回来肯定能带东西吃，结果一张都没卖掉，全家人只能抱头痛哭。后来他们借钱，在官路的旁边开了个鸡毛店，人称“冷店”，门口放一个草编的篓子，篓子里放着馒